



苏联的民族政策 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实行

[文章编号] 1001-5558(2012)02-0005-10

●[乌兹别克斯坦]穆尔塔扎耶娃 张娜译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E

时 间 2008年5月15日,14:00~17:00

地 点 中央民族大学

主讲人 穆尔塔扎耶娃教授(乌兹别克斯坦国立大学)

主持人 杨圣敏教授

翻 译 张娜教授

整 理 罗惠翔博士

主持人(杨圣敏):

各位老师,各位领导,我们非常荣幸地请来了乌兹别克斯坦国立大学的穆尔塔扎耶娃教授前来访问并作演讲。今天她准备作一个关于乌兹别克斯坦民族问题的演讲,主要内容包括1917~1990年这段时间的民族关系和前苏联的民族政策。我先介绍一下她的基本情况。

在介绍她本人之前,先介绍一下乌兹别克斯坦国立大学。因为在场的各位有的比较了解,也有些人不了解这个学校的基本情况。乌兹别克斯坦国立大学是中亚第一所大学,是1918年“十月革命”刚刚胜利不久,在中亚建立的第一所大学,当时叫中亚大学。在此以前中亚没有大学,它是第一所。到了1920年时改为塔什干国立大学,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改为乌兹别克斯坦国立大学,是中亚几所比较好的大学之一。

穆尔塔扎耶娃教授原来是这个学校的副校长,做了十年的副校长,一直从事民族问题研

究。她是历史系教授(因为民族学在历史系),主要从事民族关系、苏联民族政策研究。在乌兹别克斯坦,她就是民族问题的首席学者。今年2月,我们请的乌兹别克斯坦国立大学的副校长(海达洛夫)是她的学生。她在这方面有很多著作,我在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我们就想请她来作十天左右的访问,和我们的学者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交流。

我们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者、中国学术界跟国外的交流越来越多,可是在前些年我们比较多地交往的还是西方国家,与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交流比较多,像我们学院基本上每个月都有国外学者来访,去年一年请了大概五十位,包括美国的、日本的、法国的。我感觉,我们和西方、欧洲甚至和日本的民族学家或人类学家关于民族问题的交流还是比较多,而和中亚、前苏联或俄罗斯交流得比较少。尤其中亚是一个民族问题焦点的地方,有很多民族问题方面的经验。我们的民族政策、民族关系,更多地是跟随前苏联,因为我们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更多地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建立的,我们的民族关系问题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希望加强与俄罗斯的,还有中亚这些国家的学者们的交流。基于这样的想法,今年2月份我们请了八位,包括俄罗斯的、乌兹别克斯坦的、吉尔吉斯斯坦的学者来交流。他们讲得很好,大家反映也很好,所以这次请了乌兹别克斯坦国立大学的穆尔塔扎耶娃教授来交流。我们非常希望中亚的学者,尤其是像穆尔塔扎耶娃这样的权威学者,来谈谈他们的看法以及他们的研究。

今天参加研讨会的有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厉声主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马戎教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许涛、许伊娜研究员,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包胜利研究员,《中国民族报》社的赵学义社长、孙太辉副总编,国家民委的胡敬萍处长等各个方面的专家、领导,另外还有我们学校——中央民族大学的邹吉忠、王建民、熊坤新教授等。他们都是作民族问题研究或中亚研究的学者。我们今天的安排是先请她作半个小时左右她个人一些观点的简单介绍,她讲完之后,我们可以和她讨论。我们今天有一下午的时间,大家有充裕的时间交流和讨论。

那么,我们现在就请她来作演讲,大家欢迎!

穆尔塔扎耶娃:

首先,我特别高兴和各位见面!

今天的话题是 苏联的民族政策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体现。

首先,我谈苏联时期民族政策最主要的方面及其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体现。在苏联解体之前,苏维埃国家制订民族政策遵循的主要原则是列宁的民族政策——民族自决。民族自决的政治含义是每个民族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民族事务,谁也不能从外部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这个民族。但实际上,这是民族政治政权斗争的一种形式。苏联共产党主要关心的是保证苏联国家统一的牢不可破。苏维埃国家在推行俄罗斯化和民族同化政策的同时坚守了这一原则,乌兹别克斯坦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列宁将多民族相互接近、融合称为人类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认为这是消除民族隔阂、减小民族差别及进行民族同化的世界性历史趋势。列宁的这种各民族互相接近、融合的原则在苏维埃政权年代实际上是俄罗斯民族对其他较小民族的融合,是强制性的俄罗斯化并且消灭民族文化。苏维埃国家于1917年决定在苏联成立新的具有相同民族文化、心理特点的苏维埃人民共同体,并形成了一些新的概念,如精神和经济共同体、苏维埃祖国、苏维

埃经济、苏维埃自我意识、苏维埃性格、苏维埃传统以及苏联文学艺术风格等等一些新的概念。我们在承认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在内的共和国取得了明显成绩的同时,必须指出的是,苏联民族政策所取得的成果是有局限性的,它同各民族的利益没有共同之处。俄罗斯人在非俄罗斯民族之上建立起了军事政治国家,没有民族平等,确立了俄语的特权地位以及俄罗斯文化的统治地位。在经济领域,推行旨在全面发展全部加盟共和国经济、完善加盟共和国经济分工的政策。但是这个政策的实行没有考虑到各个民族的利益,只服从于全联盟国家的利益,建立了统一的苏联国民经济综合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乌兹别克斯坦充当的是苏联原料基地的角色。在苏联时期,俄语不但成为了各民族交际和合作的工具,也是扩大和加强苏联各民族之间联系的工具,是了解世界文化成果的工具,但俄语普及程度的提高给各民族语言自身的发展造成了损害。

苏维埃政权提出了“民族自决、民族自由发展”的口号。这个口号能够增强民族的自我意识,激发各民族对自由、光明和知识的热情向往。在这种条件下,各少数民族无论是在与政权机构的相互关系方面,还是在与本地区大的民族之间交往方面,可能产生并且已经产生了各种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十月革命后首先成立的突厥斯坦民族委员会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这个委员会下设少数民族局。在一份公布的该委员会任务和工作的资料中指出,突厥斯坦民族委员会少数民族局的主要任务是调整突厥斯坦共和国各民族多数居民的生活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关系,保护他们在革命建设中被忽视的权利和特殊的民族利益。还成立了专门负责民族关系问题的机构,该机构内配有少数民族事务部门。这样,可以深入了解少数民族问题,对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途径进行科学的论证,并贯彻执行解决方案,以此消除民族矛盾,防止出现可能的民族仇视。

突厥斯坦共和国人民教育委员会下设少数民族事务委员会,这体现了对少数民族利益需求的重视。该机构的使命首先是研究少数民族的精神需求,并采取实际行动给予满足。上个世纪20年代,该民族事务委员会下设下列中央局,有亚美尼亚局、伊朗—阿塞拜疆局、土著—犹太局、乌克兰局、鞑靼—巴什基尔局、日尔曼局和犹太局,这些局的任务是为少数民族开设母语学校,提供相应的课本和师资力量等。民族事务委员会战后头几年的一些文件记录了边区人民与政府机构之间的某些紧张关系,例如,在1919年11月的一份关于吉尔吉斯(当时是指哈萨克)状况的报告中,指出了突厥斯坦的严重状况。在突厥斯坦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实行的民族政策尽管存在一些失误,但总体上既体现了边区大的民族的利益,也体现了少数民族的利益。政策中的一条路线是不允许损害少数民族的任何利益,应满足少数民族的需求。这条路线无论在社会层面上,还是在共和国的层面上,都得到了体现。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调查民族关系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是定期召开少数民族代表会议,会上少数民族代表可直陈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提出这样或那样的解决途径。乌兹别克斯坦分别于1929年、1932年、1935年召开了三次这样的会议。这些会议的材料既反映了民族政策在保障各民族平等生活方面的成就,也揭示了那个年代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二三十年代实行的地方化政策本身是正确的,其目的是消灭民族边区从前的落后,全面发展各加盟共和国大的世居民族的语言,使这些民族形成自己的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但有时超出了理智的范围,损害了一些少数民族的权益。应该强调的是,苏联国家的俄罗斯化政策

以及对当地各民族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权益的损害,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苏联时期的驱逐——对少数民族的驱逐——一般不是在 20 世纪的 30 至 50 年代才盛行,一般认为还更早一些。非常残酷的镇压政策,其中包括驱逐,在苏维埃国家形成的最初时期就已经开始实行了。那时出现的任何社会冲突都是靠采取残酷的手段来解决,不仅针对不同民族的一些居民,而且还针对整个民族。20 世纪 20 年代,在社会管理制度形成之前的情况下,受到这种镇压的有哥萨克人、朝鲜族人、阿留申人,还有远东地区的一些民族,以及西北部的芬兰人,当然国家并没有考虑少数民族的利益和意愿。

斯大林还用这种方法来对待其他民族。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世界的政治形势,包括欧洲的和东方的都发生了变化,这对苏联产生了影响,其政策通常伴随着采取残酷的措施,其中包括民族关系方面。各个民族似乎都要被用筛子来筛选一下,区分出可靠的和不可靠的民族。在战争中似乎能够向敌人投降的民族被理解为不可靠的民族。在苏联国家对内政策中,间谍恐怖症和怀疑加强,这(间谍恐怖政策)不仅针对社会中的一些成员,而且也针对整个民族。在这一时期,在中央的一些报刊中,其中包括比较有名的《真理报》,经常出现一些有关间谍的报道,就不足为怪了。清洗不可靠的民族首先是从苏联的边疆地区开始的,然后按照同样的原因向内地和其他民族推进,如朝鲜族、日尔曼人、波兰人、库尔德人、伊朗人、希腊人等。正是由于“不可靠”这个原因,1944 年灭斯赫金—土耳其人、库尔德人、赫姆申人等其他的一些民族被迫迁出格鲁吉亚。针对上述少数民族的驱逐具有完全的预防性特点。在 1936~1944 年期间,苏联在边境地区已经没有什么重大的军事行动了,但是那里同样采取了这样的针对少数民族的措施。

驱逐政策也用于北高加索的一些民族,包括卡拉恰耶夫人(也就是卡拉恰伊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巴尔卡尔人,以及那些被指责为“背叛祖国”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因此,他们的民族国家政体也被撤销。

这种驱逐现象可以按两个标准来划分,一是预防性的,一是惩罚性的。根据对驱逐过程的领导部门——苏联人民委员会、各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联共(布)边区委员会、内务人民委员会、苏联克格勃、隶属苏联人民委员会和俄联邦人民委员会的移民事务总局及其他部门的一些文件所进行的研究,这种划分是可以的。

苏联时期的这种驱逐,原因可以划分为如下几种:

一是该民族不接受所建立的制度,也就是苏维埃政权,不接受新的生活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这样的民族包括哥萨克人和其他部分讲俄语的居民,还有波罗的海沿岸以及摩尔多瓦的一些民族,如波兰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等。

二是按照所谓的防御性特征,一些民族被指责为与侵略国合作,这样的民族有日尔曼人、库尔德人、灭斯赫金—土耳其人、赫姆申人,还有希腊人。

三是,似乎该民族全体都反对苏维埃政权和红军,虽然远不是这样。这样的民族有车臣人、印古什人、巴尔卡尔人、卡拉恰耶夫人、克里米亚鞑靼人、保加利亚人、卡尔梅克人和一部分土耳其人、亚美尼亚人。

四是不可靠的原因,因此而被驱逐的民族有伊朗人、部分库尔德人等。

这种划分表明,苏联时期对各民族的驱逐,原因是不同的。20 世纪 30 和 40 年代,有 60 多个民族受到这种镇压,其中 15 个完全被驱逐,那时被驱逐的民族人口总数达到 350 万人。

通过对这些民族的驱逐与镇压,苏联国家管理部门的权力得以维持和加强。驱逐政策实际上在苏联所有地区进行,下面这两个地区属于重点接受被驱逐者的地方:一个是西伯利亚,一个是中亚。许多民族被强行驱逐到乌兹别克斯坦,最先被驱逐来的是朝鲜族人。在1937年8月21日通过的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将朝鲜人从远东边区的边境地区迁出》的联合法令通过之后不久,1937年10月和11月就共有74 500人(16 307个家庭)来到乌兹别克斯坦,其中大部分于1939年迁到乌兹别克斯坦的饥饿草原。

随后迁来的有克里米亚鞑靼人、灭斯赫金—土耳其人、库尔德人、赫姆申人,还有北高加索的一些民族——波兰人、希腊人、卡尔梅克人等等。由于驱逐政策,在乌兹别克斯坦和苏联的其他地区都强行建立了一些少数民族居住区。那时的乌兹别克斯坦从社会经济方面来说,没有准备接受这么多的移民,但这些措施具有某些军事战略特点,因此必须立刻执行,因此,乌兹别克斯坦面临着许多问题要解决。20世纪30年代中叶,乌兹别克斯坦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在苏联处于比较靠后的位置,不仅不能保证移民的正常生活条件,就连自己居民的正常生活条件也难以保障。

就先说这么多。这里主要说的是二战前,乌兹别克斯坦多民族格局的形成过程。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前的这种民族迁移,即乌兹别克斯坦后来的移民不是由驱逐政策造成的,而是苏联共产党将一些干部派到乌兹别克斯坦造成的。1984~1989年,移民就像空降兵一样来到乌兹别克斯坦。这些人主要是斯拉夫民族的一些人,比如说,俄罗斯人、乌克兰人还有白俄罗斯人等。他们主要是在中亚地区的党政部门和一些科技部门担任职务。由于这么多的俄罗斯人过来,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在乌兹别克斯坦出现了一些民族关系方面的矛盾,发生了很多冲突,其中一些比较有名,最有名的就是费尔干纳盆地的一个事件,还有其他的一些地区也出现了一些冲突。

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在乌兹别克斯坦作关于其多民族形成的研究,经常使用档案材料、公开发表的材料来进行。我现在主要回答一下大家感兴趣的问题。

杨圣敏 我昨天晚上和她商量了一下,想让她多讲一点。后来她说,要讲的话太多了。她说,不如少讲一点,有什么问题大家一起讨论,这样更好。因为她本人在这方面著述很多,她发表过100多篇论文。她担任副校长十年来,有些政府问题,她也参与其中,因此,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请看地图,以便大家可以对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有一个总体的印象。

马戎教授 很高兴有机会了解乌兹别克斯坦的民族关系和历史发展情况。我了解乌兹别克斯坦人口的基本情况。在全国人口中,乌兹别克人占多少,俄罗斯人占多少,有没有对外的资料?俄罗斯人中有多少人能讲乌兹别克语?乌兹别克人中有多少人能讲俄语的?在乌兹别克的俄罗斯人当中,大体上有多少俄罗斯人是在乌兹别克出生?另外就是现在的不同年代(上个世纪的70、80、90年代),乌兹别克人与俄罗斯人的通婚比率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它的规模和趋势?也就是三个主要问题,一个语言能力,一个出生地,一个通婚状况。另外在独立之后,有多少俄罗斯人永久性地离开了乌兹别克斯坦?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俄罗斯人主要在哪里住?城乡的比例如何?以及乌兹别克人的对比状况如何?是否相似?

答 先回答您第一个问题,有关乌兹别克斯坦的人口基本情况。乌兹别克斯坦的最后一次人口普查是在苏联时期(没有解体前),是1989年。虽然说,在独立期间我们没有正式的人

口普查,但是我们也有专门的类似统计司的统计部门,他们会定期发布有关人口方面的一些资料,我主要是根据这些资料来回答你的问题。根据2000年最新的统计资料,乌兹别克人占总人口的比例是78.4%,第二位是塔吉克人,第三位是俄罗斯人,占4.1%。关于其他的一些民族呢,我也有一些资料,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我可以给您看一下。

第二个问题,俄罗斯人说乌兹别克语。这些资料来源于社会研究评论、社会学家所作的研究资料等。独立之后,有很多其他民族的人都想学乌兹别克语,但是现在来讲,这方面的成就不大。现在有30%的俄罗斯人能说乌兹别克语,主要是住在费尔干纳盆地和泽拉夫尚盆地,塔什干也有一些,但是很少。乌兹别克人说俄语,有年龄上的不同。在独立前出生的人,比如我,我们说俄语,这样的人80%会说俄语,独立之后出生的这些孩子,他们不大懂俄语。在独立之初(学校里)学俄语的学时一下子就减少了很多。但是现在,四年前,人们意识到学俄语的重要性和现实性,现在又有所增加。我们经常出现一边倒的情况,比如说30年代时,那时的人们都要学俄语。现在俄语对他们来讲是一种科学语言,学俄语能够提升文化程度。在高等学校(大学)里面,一、二年级都学俄语。现在也出现了一种情况,俄罗斯人不愿学乌兹别克语,因为现在的情况是乌兹别克人都在说俄语,所以俄罗斯人认为没有学习乌兹别克语的必要,很少有人学习乌兹别克语。

第三个问题,俄罗斯人出生在乌兹别克斯坦。从历史上讲,乌兹别克人是一个定居民族,2700万的乌兹别克人,都是定居的。现在随着移民过程,有一些乌兹别克人去国外了,但很少,仅有百分之五六。

马戎教授:现在生活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俄罗斯人有多少是本地出生?

答:以前,比如说苏联时期(俄罗斯人)从俄罗斯迁过来。苏联时期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俄罗斯人在乌兹别克斯坦出生的占到70%~80%。二战后大撤退,好多工厂都过来了,所以很多俄罗斯人也过来,他们都永远地留在这里了。20世纪70和80年代,有很多俄罗斯人过来找工作,许多人喜欢这里的气候,愿意来,不愿意走。二战前,也就是二三十年代的那个时候,乌兹别克人喜欢与俄罗斯人结婚,其目的是想向俄罗斯人学习俄语,提高自己各方面的地位。乌兹别克人娶俄罗斯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可是如果乌兹别克的女孩嫁给俄罗斯人,就是将女孩推出家门。在随后没有这方面的统计资料,大概是40%的通婚家庭,地区不同,数据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塔什干通婚的家庭比率就会高一些,其他一些地区比如说费尔干纳盆地、布哈拉其他的一些城市,通婚率比较低一些。通婚家庭好多是一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比如说,党政干部家庭。乌兹别克第一任党书记娶俄罗斯的妻子,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就说,娶这个俄罗斯妻子的目的就是学习俄语。现在这种通婚家庭比较少一些。现在比如说两个孩子一起上学,产生爱情,这种情况下出现的通婚比较多一点。

马戎教授:非常感谢!这些人口的基本态势让我们了解到了乌兹别克斯坦人交往的大致客观背景。

答:下一个是关于城乡居住的问题。在苏联时期,85%的乌兹别克人都住在农村,城市里大部分是斯拉夫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独立之后,大部分说俄语的欧洲居民迁回了,如鞑靼人。因此,有很多乡下的乌兹别克人来到了城里,比如说塔什干的很多农村人和乌兹别克人就来到了市里。

马戎教授 独立之初有多少外迁了？

答 现在就是说独立之后的前五年吧 , 大部分的俄罗斯或斯拉夫人都迁回去了 , 大部分都走了。现在一说欧洲居民 (人们) 马上想起来的就是朝鲜族人。

马戎教授 独立之前 , 俄罗斯人占有多少比例？

答 这里有个材料：

俄罗斯人 : 1939 年 , 城市里的人 35.5% 是俄罗斯人 , 乡下 4.4% ; 1959 年 , 城里是 33.5% , 农村没有 (缺失) ; 1979 年 , 城里是 24.8% , 乡下是 1.2% ; 1989 年 , 城里是 19.5% , 乡下 0.7% 。
乌兹别克人 : 1939 年 , 城里 40.3% , 乡下 72.5% ; 1959 年 , 城里 37.2% , 乡下 74.8% ; 1979 年 , 城里 48.1% , 乡下 82.8% ; 1989 年 , 城里 53.7% , 乡下 83.5% 。

杨圣敏教授 还是像刚才所说的 , 大家有什么问题 提出来 , 看看大家有什么看法。

我先说两句 , 前两天我看一本书 , 关于前几年中亚五国问题的。正好我看到乌兹别克斯坦不同民族比例的一个数字 , 那上面写到 现在有俄罗斯人 30% 左右。刚才我听她一讲 , 那个数字太不可靠了 , 肯定是较老的数字 , 不知道在哪里找到的。所以我就感觉 , 要想了解当地的情况 , 还是要向当地的学者了解。我有一个问题 : 中亚地区五个加盟共和国 , 五个主要的民族 , 都是 1923 年塔什干会议的时候定的 , 我就问一下 , 如果不是当时政府定出那五个民族 , 如果按您的看法 , 中亚的这些民族应该划分成几个主要民族？

答 : 非常有趣的问题 , 至于谈到上世纪 20 年代民族划界问题 , 我今天带来了一些资料。有一份是说当时的民族划界没有考虑到当地民族的利益而进行。从资料可以看出 , 划界的主要领导人都是从莫斯科来的 , 他们当时划界主要考虑莫斯科的政治经济利益。今天的实践证明这种划界是不正确的。我们认为 , 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一个区里 , 有 90% 以上是乌兹别克人 (划界时) , 塔吉克斯坦的一个叫苦盖的地方有很多的乌兹别克人。所以根据这一点可以看出 , 当时划界没有考虑民族因素 , 民族对他们来讲其实是无所谓。现在乌兹别克斯坦并没有热烈地讨论这个问题 , 认为这样可能会引起民族仇视。在我们乌兹别克斯坦的教科书中只是列举事实 , 让读者自己作判断 , 对或错。现在乌兹别克斯坦可以划定为七个当地民族 , 或叫世居民族。其中除了这五个大民族外 , 还有卡拉卡尔帕克和维吾尔族 , 都被定为当地民族。比如说 , 在乌兹别克斯坦和中亚这块土地上除了这几个大民族外 , 还有很多民族。我认为 , 1924 年的划界是没有必要的 , 每个民族可以按自己的轨迹往前发展。

马戎教授 那么就是说民族识别是没有必要的？

答 : 也不是说绝对是这样的 , 看从哪个方面说。也有积极的方面 , 比如说 , 我们形成了自己的国家。从大的方面讲 , 国家划定了界线 , 有自己的疆域领土 , 形成国家标志 , 作为一个国家存在了 , 这也是一个非常积极正面的因素。每一个过程都有正面和负面的因素。负面的应该是考虑当地民族的利益更多一些。

马戎教授 : 因为我看过一篇文章 , 说当时划界的时候 , 费尔干纳盆地的一些民族全改成穆斯林民族。是这样子吗？

答 : 是的 , 有。根据乌兹别克斯坦的普查 (前苏联是 20 年一次人口普查) 根据这些资料 ,

可以看出,每次人口普查的民族都是变化的。1939、1959年的人口普查是不客观的,那时斯大林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就定下乌兹别克斯坦应有60个少数民族,现在却有136个民族,1939年之前也是100多个民族。其做法就是将人口较少民族都归入世居民族中,如塔吉克。一种情况是强制,另一种是他们愿意归入乌兹别克。费尔干纳盆地当时有一些维吾尔族的聚集区,他们就成批变成乌兹别克人。战前人口中有0.3%的中国人,战后就一个都没有了。他们可能是合到东干族里了,也就是一些小民族合到大民族里去了。有时候人口普查,比如1939年的人口普查,其中就没有民族这一栏。现在民族为什么这么多呢?多是因为在独立后复兴少数民族运动中,多民族可以自由发展。现在乌兹别克有140多个这样的(民族)文化中心,到1989年时,民族就很多了。根据独立后的2002年的国家统计资料,也就是刚才说的136个。

马戎教授:现在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民族学界,如何看待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和民族理论?

答:斯大林是一个很好的民族理论家,他的民族理论,学者们都很了解,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现在来说,对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和定义还是接受的。我们现在认为,不是他一个人一开始就提出了民族理论。我刚才说的是对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本身是没有否定的,对其他的一些理论,如民族融合等,则有了新的理解和改变。他的民族理论在现实没有得到证明,因为苏联已经解体了。

马戎教授:斯大林的理论是好的,后来斯大林,包括在战前和战后,在对待具体民族的很多做法上,不够民主。就是说理论的本身还是好的?

答:不是针对他的整个理论,好的只是指他的定义,至于其他的理论则有不同的看法。

马戎教授:那制度方面呢?如联邦制的设计,对群体的优惠,民族利益,四个共和国,四个州。

答:历史上国家是有分有合的,先分再合。实现这样的制度需要很发达的国家,使“分”的国家再“合”起来。现就中亚国家的发展状况看,我个人认为,还没有达到发达的程度使国家再联合起来。

胡敬萍:我是在2006年去乌兹别克斯坦考察。当时我去了东干族、维吾尔族文化中心,并和成员进行了座谈,了解一些民族工作机制,以及这方面的情况,但是了解得不充分。今天想问,目前乌兹别克斯坦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与前苏联时期有什么最显著的区别,特别是在民族工作机制和民族关系的调节方面?国家的制度安排以及处理民族关系的机制是什么?

答:现在乌兹别克斯坦有一百四十多个民族文化中心,在解体前,1993年成立共和国民族文化中心,在前苏联时就已建立了文化中心。现在在乌兹别克斯坦,从民族关系来讲是非常稳定的。首先,得益于乌兹别克斯坦在宪法中有专门条文保障民族关系,法律保护公民权利。这些法律保障了所有公民平等,无论民族如何。那么还有一个文件——语言法(1998年),将乌兹别克语作为国语确定下来,这样就可以促进其他民族的发展,因为大家有了一个统一的语言来发展。现在文化中心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它们支持乌兹别克斯坦的少数民族,建立与他们祖国(或者故乡)的联系,恢复历史传统和语言。

包容性在民族发展中占主流,族际包容在我们这里起很大作用。如果这里有两个俄罗斯人在场,则我们就用俄语交谈。具体到东干、维吾尔族(维吾尔族已经定为当地民族之一),他们是18、19世纪到乌兹别克斯坦的,开始不叫这个名字,他们属于不同部族。到20世纪定为

维吾尔族和东干族。

熊坤新教授 第一个问题是,乌兹别克斯坦政府有没有专门负责处理民族事务的工作部门,像我们国家民委这样的部门?第二个问题是,请教授简单介绍一下乌兹别克斯坦现行的主要民族政策,这里面包括前苏联一直倡导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政策,还有民族经济、文化方面的政策。我个人认为,我们国家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相对于前苏联而言,最重要的经验是我们在全国的民族地区开设民族院校,我们开设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课程,这些所起的效果应该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在前苏联和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有没有开设这样的课程?

答 现在,乌兹别克斯坦没有专门调节民族关系和主持民族事务的工作部门。在前苏联时期曾经有过,1918年到1924年间存在过,后来没有了。现在民族事务的调节主要是由文化中心来作,没有一个管理部门。

现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民族问题不尖锐。现在实行的是民族和谐政策,所以主要问题是由宪法和法律条文来约束的,不存在为民族权利而斗争的现象,大家都提倡民族和谐。我们没有专门的民族大学,我们学校的名字中也带有 nationalities,相当于民族,其意义和中国是不同的,在乌兹别克主要是指国立的意思,在中国则是民族的。有外语学院和东方学院,专门民族方面的没有。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人问有关民族的问题。我们在大学中有类似于公修课的课程,占25%(四年中的总课程)的社会学和人文科学的课程。在所有这些课程中渗透有民族独立的思想,就是将整个国家独立思想渗透到各门课程当中,没有专门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这样的课程。哲学等其他类的都有专门的,但至于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则没有专门的。

马戎教授 他们强调的是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概念,不强调民族。

厉声研究员 乌兹别克语是国语,但是您前面提到了俄语是科学语言。我想知道这个科学语言的内涵与外延是怎样定位的?也就是科学语言的概念。

答 这是我说的,我个人的看法,我这个话在学生中也公开说。或许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我认为,乌兹别克语肯定是第一位的。那么俄语,因为也应该了解俄国的经典文学等一些经典的东西,因此,我认为它是科学的。在苏联时期,尤其是1938年强制学俄语之后,我们全部都是学习俄罗斯的文化,俄罗斯的历史、文学,我们自己民族的,比如说乌兹别克的历史呀或文学呀,都没有办法了解它们,学习它们。解体之后我们开始复兴自己的语言和历史传统,则乌兹别克语是主要的。我对您也有个问题,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应该学习俄语吗?

厉声研究员 应该的。

许涛研究员:一个是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如何处理跨界民族问题,因为在中亚和国际社会,跨境民族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刚才您在报告中已提到了。乌兹别克人在塔吉克斯坦,它既涉及内政,也涉及外交。第二个是 махалля,它是乌兹别克斯坦历史上的村社,现在成为乌兹别克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的单位,那它在民族关系上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答 :在乌兹别克斯坦没有跨界民族 ,也不是说没有 ,就是不研究跨境民族。国家是没有界线的 ,这个问题应该是国家之间的事情。总的来讲 ,应该是在中亚这五个国家层面来调节各国关系 ,作为学者是研究不了这样的问题的。

Махалля 是个村社或社区概念 ,是一个独立的行政单位 ,自己解决自己的内部问题。按照乌兹别克斯坦的传统 ,现在已确立它的位置 ,成为一个专门的组织机制。现在设有专门的法律保证它的发展机制 ,它可以分配资金 ,给生孩子的人一些钱 ,可以做这样的一些事情。一些生活上的事情 ,可以通过它来解决。它的领导人是国家发工资。如妇女问题等等方面 ,它起了很大的作用 ,尤其是在日常生活中 ,如离婚 ,就不需要到法庭去 ,直接找它就可以办了。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 ,所以我们的学生在作毕业论文时就有专门研究这方面的。

包胜利研究员 :怎样看蒙古人对乌兹别克人的历史影响 ?苏联的解体对你们来说是悲剧还是解放 ?

答 :蒙古人的入侵 ,俄罗斯和中亚的学者都在反思 ,和历史上的传统观点不一样。比如说现在 ,俄罗斯著名导演拍的《蒙古王》(或《成吉思汗》)现在有卖的。但在这种反思中 ,不同的思想观点在乌兹别克斯坦还没有出现 ,包括在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教科书里边都没有提出观点。这种反思现象首先出现在哈萨克斯坦。但我认为 ,苏联的解体对我们来说是个解放。

杨圣敏教授 :今天就座谈到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翻译张娜教授 !

[收稿日期]2012-03-03

[讲者简介]穆尔塔扎耶娃 ,乌兹别克斯坦国立大学教授。

Nation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China is an Urgent Task in Order to Face the Challenge in the 21st Century

Ma Rong

Abstract: 21st century is a period of intense competition among nation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trade, resources, innovation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 Every nation has to concern about the construction of its “soft power” in facing such a competition. First, the political identity of all citizens towards its country must be strengthened. Second, there should be a common ideology and social norms accepted by all citizens. Third, intelligence and capability of innovation of citizens are preconditions for economic prosperity.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China should do to strengthen the national identity and establish a common national cultural and value system for all Chinese people.

Key words: Soft power of a nation ; National political identity ; common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See P.21)